

# “现代乡愁”的社会性基础

董彦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Email: yanfengdong@pku.edu.cn

收稿日期：2020年9月6日；录用日期：2020年9月20日；发布日期：2020年9月27日

## 摘要

基于以往哲学、文学、美学角度审视“乡愁”的局限，本文试图勾勒两种不同的“乡愁”类型，并探究“现代乡愁”的社会性基础。本文首先简要概括了“乡愁”的意涵、特征与生成条件；其次阐明“传统乡愁”和“现代乡愁”两种理念型在时空条件、承载主体、客体指向、表现形式、客体特征、心理体验、触发情境和商品转化诸方面的不同，以及在“传统乡愁”向“现代乡愁”过渡阶段，“乡愁”自身的特点及其群体差异；最后指出：人们生活方式和联结纽带的转变，奠定了“现代乡愁”作为一种抽象情感依托的社会基础；乡村与城市互为他者的文化建构及其意象的“颠转”，构成了“现代乡愁”生成的话语形式及其时空条件；乡土变迁中“社会底蕴”的稳固性与特定的时代氛围，为“乡愁”扩展为近乎全社会共享的情感体验，提供了内在文明基础与外在社会条件。

## 关键词

“乡愁”，类型，社会性基础

#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Nostalgia”

Yanfeng D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Email: yanfengdong@pku.edu.cn

Received: Sep. 6<sup>th</sup>, 2020; accepted: Sep. 20<sup>th</sup>, 2020; published: Sep. 27<sup>th</sup>, 2020

## Abstract

Based 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previous philosophical, literary, and aesthetic views on “nostalgia”,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outlin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nostalgia” and explores the social basis of

“modern nostalgia”. First, this article briefly summaries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merging conditions of “nostalgia”. Secondly, it clarifies th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traditional nostalgia” and “modern nostalgia” in terms of the conditions of time and space, major carrier, object orientation of nostalgia, expressive form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bject of nostalgia, the contexts triggering nostalgia, and commodity transformation, and in the transition stage from “traditional nostalgia” to “modern nostalgia”, “nostalgia”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group differences. Finall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s lifestyles and bond ties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nostalgia” as an abstract emotional support;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city seeing each other as the others and the “reversal” of their images constitute the discourse forms and the time-space conditions; the stability of “social ground” and the specific atmosphere of the time in social changes provide the inner civilization foundation and external social conditions for the expansion of “nostalgia” into a shared emotional experience by the majority.

## Keywords

“Nostalgia”, Types, Social Foundations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导言

家国之思、怀乡之情，很早便是中国文学作品的主题，“乡愁”更是中国文人情感抒发的重要内容：或是表达去国怀乡、忧国忧民的情感，或是抒发动荡飘零、有家难回的感受。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等千古绝唱。在传统社会，跨地域的社会流动极为有限，因而这种思古怀乡之情一般只存在于文人墨客、贩夫走卒、商贾旅客、深宫怨妇、边关将士等有限的少数流动群体中，而真正留下声音，见诸文字的则多是识文断字的读书人，遑论“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普通乡民了。

然而，随着人口激增以及更大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人由“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步入不断流动的“陌生人社会”[1]，由乡村进入城市、由村民成为市民、由农民成为工人等。“流动”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乡愁”不再局限于传统社会中特定群体的体验，而成为特定情境下近乎所有人的“共同”感受，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情感状态。如：每年春节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远千里回家过年的骑客、社交软件中各种“返乡”叙述等。在人口流动与空间阻隔成为常态的社会，似乎每个人都成了“游子”，“乡愁”（怀旧）已经扩展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情况，每个个体的困境也意味着整个群体的困境[2]。

以往的“乡愁”研究，多从哲学、文学或美学的角度审视“乡愁”，却忽视了“乡愁”生成的社会性基础，及其类型学差异。以本人为例，笔者对“乡愁”的关注，既与自身的成长经历，也与调研的经验感受有关：笔者从小就在中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小村中出生、长大，自大学之后就很少回到村里，也较少体会到“家乡”对于自身存在的意义，但在每次人生紧要关头犹疑未决时，总会不断地回到“家乡”，忆及从前；田野调查时与那些不断飘零的他人的接触中，在不断地回忆、对照、反观自我及“家乡”的过程中，笔者逐渐认识到“家乡”对于自身存在的意义，但并非每一个流动的、飘零的他人都是“有家可归”或“有根可依”的，“乡愁”既有时代精神特有的烙印，也有不同群体的差别。比如土生土长的

乡下人或农民，在成年后不断的人生流动中，其“乡愁”既有“有家可归”、“有根可依”的情感体验，也有在城乡之间不断流动过程中“有家难归”、“有根难依”的无奈。但对于自童年时期，就随父母四处飘零、辗转谋生的人而言，“乡愁”则是一种“无家可归”、“无根可依”的心理体验。

基于此，本文首先厘清“乡愁”的内涵，并阐明其核心特征与生成条件，其次区分了“传统乡愁”与“现代乡愁”两种不同类型的“乡愁”，最后探讨“现代乡愁”的社会性基础。

## 2. “乡愁”的意涵、特征与生成条件

### 2.1. 何为“乡愁”

从词源学的角度而言，中西对“乡愁”的理解略有差别。

“乡愁”对应西文有两个词汇：*nostalgia* 和 *homesickness*。*Nostalgia* 一词，又译“怀旧”，源于两个希腊词根 *nostos* 和 *algia*，其中 *nostos* 是“回家、返乡”的意思，*algia* 则指一种痛苦的状态；*homesickness* 则由 *home* (家)和 *sickness* (病痛或伤害)两词合成。17 世纪晚期(1688 年)，瑞士医生首次使用了 *nostalgia* 一词，专指一种众所熟悉的、痛苦而强烈的思乡病。因此，*nostalgia* 或 *homesickness* 最初都与对“家”的眷恋有关，或者说是思慕回家的焦虑感[3][4]。而 *nostalgia* 最初表述的只是一个空间层面上的意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怀旧理论的成熟，才逐渐扩展到时间的层面上，不少学者甚至认为 *nostalgia* 与亚当、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有关。“总体上看，自 17 世纪晚期到 21 世纪初，怀旧经历了一个由生理病症转变为心理情绪再变为文化情怀的过程，怀旧研究的领域也从病理学扩展到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乃至哲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3] P. 17)。因此，西语中 *nostalgia* 这一概念经历了从空间维度向时间维度、从具体层次向抽象层次的扩展。

“乡”字据甲骨文，像二人对食形，和“饗”原本是一字，整个字像两个人相相对坐，共食一簋的情形，本意是用酒食款待别人，后来假借为行政区域名。《说文解字》中有“乡，国离邑，民所封乡也”的说法。作为一种表意符号，“乡”的“所指”是社会基本的建制单位，如《周礼》中“五州为乡”，本指人的生长、立身之地；其“能指”意义，则随着社会发展而愈益丰富，涉及到精神文化、人际关系、风俗乃至审美方面，兼具指向、表意、抒情、维系、联想之功用[5]；具体而言：既可指地理意义上的某一个村庄、某一个小城、乃至某一个国家；也可指风景意义上的大地、山川、河流、一草一木；还可指文化意义上的乡土社会、农业文明、亚洲文明、东方生活[6]；甚至是身体意义上的乡味、乡音、乡语等[7]。“愁”字在《说文解字》中表述为“忧也，从心，秋声”，本意是指“忧虑、发愁”，亦指对秋天成熟的庄稼的牵挂。因此，“乡愁”一词的字面含义是：离乡之人因对家乡的思念而引发的忧虑之情。现代汉语词典则直接解释为“怀念家乡的忧伤的心情”。

因此，从词源学上讲，“乡愁”原意是指对“家”或“乡”的眷恋，进而引申为对原初生活(如“乡音”、“乡味”、“乡俗”、“乡貌”等)的牵挂和向往。

### 2.2. “乡愁”的特征与生成条件

由上述可知：“Nostalgia”一词既可译为“怀旧”，又可译为“乡愁”，但在中文语境里，“怀旧”与“乡愁”存在明显不同：“怀旧”之“所指”，多是与“旧”有关的事物，而“乡愁”之“所指”，则多是与“乡”有关的事物，“乡”可能只是“旧”的一部分，因此，作为上位概念的“怀旧”，其实内涵与外延均比“乡愁”概念更为宽泛，本文对“乡愁”之特征与生成条件的分析，即借鉴了有关“怀旧”的研究。

基于赵静蓉的“怀旧”研究[2]，本文归纳了“乡愁”的五种特征：1) 主观体验性：它首先是一种人的主观体验，一种人的意识行为或心理现象，因此与触发乡愁的媒介或离愁别绪相区分，如杜甫“月是

故乡明”，旅途之月是直接刺激物，由此而生的思念则是感伤情怀，由旅途之月，联想到故乡之月，睹物而思乡、思人才是“乡愁”体验；2) 建构性：它是以过去为原料的一种现象性建构或虚构，是对过去的合法化与理想化，“月是故乡明”即是基于一种理想化建构；3) 价值倾向性：它体现出显著的价值倾向，显示出“乡愁”主体对某种乡音、乡味、乡俗、乡貌等情调、感受、氛围和价值观的认同，“月是故乡明”，非故乡之月的真“明”，而是价值倾向、主观认同之“明”；4) 特定情境性：它必定是在特定情境的激发下才能发生，这些特定情境包括时间间隔、空间差距、价值优劣、利益得失等，“月是故乡明”正是作者在战火纷飞、羁旅飘零之际，睹旅途之月而思乡、思人；5) 审美性：它具有满足个体心理需求的功能特性，同时也是一种美感体验，其运作方式是感性化的，“月是故乡明”既是对个体欲归家而不得的心理纾解，也是个体美学意义上的感性判断。

“乡愁”生成的前提条件有三个[3]：时间维度上的记忆和闲暇、空间维度上的阻隔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匮乏和缺失。基于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区分的线性时间观，“乡愁”生成的时间要件是记忆和闲暇：记忆是产生联想、回忆的基础，“乡愁”即是对记忆进行有意识筛选的过程与结果，闲暇则是反思、自觉的前提，亦即将“乡愁”由潜意识带入意识领域的必要条件；阻隔是“乡愁”生成的空间要件：这种阻隔，既可能是物理意义上的，如“去国怀乡”，也可能是心理意义上的，如因人事非作而叹惋；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匮乏或缺失则是激发“乡愁”之心理机制的必要条件：时空条件的改变，造成了某种匮乏或缺失，而现实生活中又缺乏相应的功能替代物弥补这一匮乏或缺失，主体感性体验中寄托的某种稳定感、确定感、安全感和归属感受到挑战，由此需要在心理上找补这种匮乏或缺失，以弥合现实中感受到的失落或人性的分裂，或与令人失望的现实处境形成抗衡。

### 3. “乡愁”的理念型：传统乡愁与现代乡愁

中国的“去国怀乡”、“凭吊怀古”之风由来已久，“田园诗”、“隐逸诗”、“山水诗”历来备受推崇；人生之追求，进则“治国平天下”，退则归隐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乡愁”已成为中国文化品格的一部分。它既指对故乡风物与旧时情景等自然风貌的怀念，也指对亲族同胞和乡党邻里等制度文化的思念，还包括对历史文化、民族传统等风俗人情的眷恋[8]。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交通技术的改进，人口持续且迅速增长、人们远距离的流动能力不断增强、城市空间变得更为开放且更具流动性，陌生人社会由此建立起来。面对全新的、现代的社会处境，国家如何管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个人如何与陌生人建立可能的关联？如何处理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一种日趋抽象且官僚化的规则体系，而非本地和个人关系，成了国家管理和个人生活之必需[9]。传统社会的组织原则和人际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社会中，作为不同个体之间联结方式的血缘和地缘，已不能满足社会现实和个体生存的基本需要，越来越多地人经由职业、政治信仰、宗教倾向等多元因素组织起来。尤其是抽象的契约或法律成为人们组织化的基本原则以及界定彼此权利义务的重要形式。与现代社会的抽象化运作类似，人们“乡愁”之“能指”也日益抽象化：不再局限于切身经历并曾身处其中的自然风貌、制度文化或风俗人情，而朝向一种对遥远过去和遥远乡村的想象性的理想化建构、一种基于陌生人社会的文化他者、或一种“传统的发明”[10]。

基于社会结构化原则、组织基础和人际关系等的变化，“传统乡愁”和“现代乡愁”具有截然不同的实质意涵，具体参见表1。

在时空条件上，传统乡愁是超越时空的，自古以来就产生于任何离家之人的主观认知与情感体验中，它源于人们对自身成长环境的“熟悉”与“亲近”，而现代乡愁则在现代社会情境中更为常见，它源于与现代社会相伴生的不确定性的增长，以及“熟悉”与“亲近”不断打破后，一种现代社会更为常见的“陌生化”、“抽象化”与“疏离感”；在主体范围上，传统乡愁多存在于文人商贾、羁旅游子等少数



流动性群体，因此，空间阻隔是“乡愁”生成的必要条件，而现代乡愁则是弥漫整个社会的一种情感状态，一种特定时代情境下笼罩全社会之上的忧愁，因此成为近乎整个社会共有的一种心理体验或文化经验；在客体指向、表现形式、及其特征上，传统乡愁侧重于“乡”，以“返乡”为中心，表现形式是对“老家”、“故乡”、“童年”等的怀念与偏爱，其客体特征一般是以物质意义上与“乡”或“家”的离散为基础，因而是相对有形、具体、且确定的，而现代乡愁则侧重于“愁”，以“渴望”、“批判”为中心，既批判现代对城市文明的迷恋，也批判同样时兴的对传统的发明，而诉诸对遥远过去、遥远乡村的想象，因而“乡”成了一种基于陌生人社会的，依凭想象而建构的、理想化的文化他者，其特征是无形、抽象、且非确定的；在心理体验上，传统乡愁中的人们，纵然限于各种物质条件而与家人离散、四海飘零，但仍是“有家可归”、“有根可依”的，村社共同体的成长生活经历，既自然而然地赋予其一种基于村社共同体的群体资格，又促进了不同成员之间的“熟悉”与“亲近”，从而成为共同体成员自我构成的一部分，以及看待、应对外在世界的基础，而随着现代社会的“陌生化”，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结的“抽象化”，以及个体自我意识的扩展，原有的、稳定的共同体生活不断被打破，个人不断地自主选择加入或退出不同的群体，“陌生”与“疏离”取代了“熟悉”与“亲近”，开始成为诸群体中人与人关系的基础，除了自我本身，个体又能将意识深层的自我情感、自我认同依托何人、何物呢？动荡与飘零、陌生与疏离，赋予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一种“无家可归”、“无根可依”的主观体验；在触发情境上，传统乡愁的直接刺激情境相对单一，且基本与物理意义上的空间阻隔有关，而现代乡愁的直接刺激情境则更为多元，消费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广告、影视作品、综艺节目、流行作品等可刺激人们对遥远过去、遥远乡村的理想化想象；在商品转化上，现代乡愁的独特之处在于可以转化为一种商品，如针对城市受众的各种乡村体验节目的盛行，并在当下社会成为一种流行时尚，而传统乡愁则一般不可转化为一种商品。

**Table 1.**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nostalgia” and “modern nostalgia”

**表 1.** “传统乡愁”与“现代乡愁”的不同特质

特质	传统乡愁	现代乡愁
时空条件	跨越时空的	现代社会情境
承载主体	文人商贾、羁旅游子等少数流动群体	近乎社会共有
客体指向	“乡”	“愁”
表现形式	“老家”、“故乡”、“童年”	陌生人社会的文化他者；一种想象性建构
客体特征	有形的、具体的、确定的	无形的、抽象的、不确定的
心理体验	“有家可归”、“有根可依”	“无家可归”、“无根可依”
触发情境	相对单一	更为多元
商品转化	不可转化	可转化

“传统乡愁”与“现代乡愁”只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型，而在现阶段的中国，大量人口在城乡之间不断流动，如农民工，他们既离不开城市，也离不开乡村，既难以在城市彻底定居，也难以在乡村稳定谋生，此时、此群体的“乡愁”，正处于“传统乡愁”向“现代乡愁”的过渡阶段，因而兼具二者的某些特点，但也有不同之处，如过渡阶段的“乡愁”生发的是一种“有家难回”、“有根难依”的情感体验，此问题下文另述。

#### 4. “现代乡愁”产生的社会性基础

现代社会的“流动化”（“变动不居”成为一种社会常态）、“陌生化”、“抽象化”，以及结构分化

背景下的“诸神之争”，消解了生活其中的人的本真性，碎片化、无序性、流动性成为人的日常生存状态，从而导致了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亦即现代人对个体身份和集体同一性的认同危机[11][12]，“都市病”即是其显著表征：既有空间意义上的“思乡”，也有时间意义上的“恋旧”，反映出人类对群体生活中自我定位的需要[13]。在此基础上，有关乡村与城市相互对立的意象不断兴起：乡村作为一个有关过去的意象而引领人们朝向以往、人性和自然的方式；而城市作为一个有关未来的意象而引领人们朝向进步、现代化和发展，而随着现代化后果的呈现，城市则转为“黑暗之城”与“光明之城”两种意象并存，而乡村则成了一种“快乐往昔”[14]。换言之，作为一种修辞话语的“现代乡愁”，折射出“传统”与“现代”两种异质文化或异类文化之间的压制与反压制、弱化与反弱化的斗争([3], p. 17), [14]，具体而言，即：传统文明对现代文明、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自然文化对技术文化、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田园文化对反田园文化的斗争，这种修辞话语的对立与竞争，和人们的信念体系、文化认同、民族国家认同等主观认知与情感体验直接相关。随着物理距离上的终结、时间快速地流逝，原本“熟悉”的变得“陌生”，原本“亲切”的变得“疏离”，人们基于原初的共同体生活而获取的稳定感、确定感、安全感和归属感愈益减弱，“无家可归”、“无根可依”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处境。

因此，“现代乡愁”，既是存在论、生存论、诗性(诗化)意义上的，也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意义上的：前者是哲学、美学思考的领域，而后者则是社会学思考的范围。而社会基础的变化，既是“现代乡愁”哲学、美学判断的前提，也是其生成的根本条件。

#### 4.1. 生活方式与联结纽带：从定居到流动，从共同体到社会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展，现代科技的进步，打破了不同地域的分离状态，跨地区流动频繁出现，个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与社会性风险增加，人们的生活方式、联结纽带、以及与此关联的情感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从“共同体”到“社会”、从“地方性认同”到“民族/国家认同”、从对具有特定社会身份的个体的效忠和依附转向对非人格化的、抽象化的规则体系的信服和依赖、从“未受教育的情感”[15]到自我意识的情感。在这个日益理想化、世俗化、瞬息万变的世界，现代性日益呈现出流动、多变、快速的特点。

“乡愁”原意是指对“乡”或“家”的眷恋，进而引申为对原初生活的牵挂和向往。而原初生活方式是一种基于固定区域的“定居”状态，对农耕文明而言体现为具体的居民村落，对草原文明(或狩猎文明)而言则体现为固定的迁移或狩猎路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彼此熟识，甚至不分你我，的基础上，人们基于彼此“熟识”与“亲切”的情感动机而凝聚成一个滕尼斯称之为“共同体”的群体，它以亲属、邻里、友谊为表现形式，以血缘和地缘为团结纽带，群体内部交往频繁，不同成员之间生活方式、主观认知与情感体验高度相似，因此“共同体”的凝聚程度更高，人与人的联结方式是有机、积极的，能够满足人们的稳定感、确定感、安全感和归属感等需求。然而，随着物理距离的终结，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不再拘泥于自然地理环境，而表现为更为抽象的社会劳动分工，传统的“家”或“乡”也只是现代生活场景中的一个“流动的帐篷”、一个“户籍”、一份“档案”、甚至是一种“电子编码”[3]，人们基于其自身目的而凝聚成一个滕尼斯称之为“社会”的结合状态，它以“大都市”为主要表现形式，包括股份公司、民族国家等等，以法律、常规、公众舆论等为团结纽带，尽管群体内部存在不同的分工，但不同部门的成员之间，生活方式有别，而主观认知与情感体验各异，因此“社会”的凝聚程度相对要低，人与人的联结方式则是机械的、消极的。由于社会劳动分工下人们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人与人之间联结方式的变化，“传统乡愁”中“家”或“乡”日益抽离于地方场景，变得抽象且模糊，那种由“定居”而来的稳定感、确定感、安全感和归属感也愈益消逝。

因此，“定居”与“流动”的不同状态，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形态。

“定居”状态下的生活模式，有助于以“定居点”为核心的人们之间生活方式之相似性的建立，以及情感认同的形成，从而满足个体的心理需求；而“流动”状态下的生活模式，人们终其一生局限于不同的分工部门和工作位置，有碍于人与人之间生活方式相似性的建立以及情感认同的形成，有碍于个体情感需求的满足。社会的悖谬之处也正在于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扩张，人们原有的生存方式被打破，原有的发展机会被剥夺，“流动”则成了摆脱现有生存压力、寻求发展机会的不得已的选择：一方面，“定居”意味着继续容忍原有的日益僵化的生活方式、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不断压缩的生存处境；另一方面，“流动”带来了机会与自由，却也打破了个体原有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原有的联结纽带。社会的不断流动，甚至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不断流动、变换，极大刺激了基于生活方式相似性的“乡”或“家”的稳定性；日常生活经验的扩展与差异，使得家人、邻里之间的相互理解成了困难，人们甚至将满怀情感，交付于更加抽象、渺茫的“远方”、“过去”、“国家”等，却又极易生成“无家可归”与“无根可依”的情感体验。情感无处依托，价值变得虚无，而欲望却在不断增长；现代性在“祛魅”的同时，也带来了认同的危机与意义的缺失。

从定居到流动，从共同体到社会，体现了人类生活方式、联结纽带和情感认同的重大转变：从生活方式极为相似的“共同体”生活到人们之间彼此分隔于不同的社会分工部门的“社会”生活、从人与人之间先赋的血缘与地缘联结到自主选择的职业或抽象理念(如法律)联结、从对具有特定社会身份的个体的效忠和依附到对非人格化的、抽象化的规则体系的信服和依赖。然而，原有共同体情感和联系的悖谬之处在于：经由对陌生的、匿名的、不具特定对象的无依无靠者、孤独的漫游者、游民、乞丐等的施舍，人们得以表达或投射这种情感[14]；人们会对远方陌生人的窘迫施以同情，却可能对身边的邻人无动于衷。简言之：人与人之间的抽象联系日益增加，但具体的情感认同却日益稀少，而不得不将情感诉诸于遥远的“过去”和“远方”；乡村作为一个有关过去的意象而引领人们朝向以往、人性和自然的方式，则提供了这种抽象的情感依托。

概言之：从定居到流动、从共同体到社会，人类生活方式和联结纽带的转变，奠定了“现代乡愁”作为一种抽象情感依托的社会基础。

#### 4.2. 互为他者的文化建构：乡村与城市

工业化、城市化，及其随之产生的社会性后果，是“现代乡愁”产生的重要社会背景，也是其生成的直接原因。

从历史来看，大多数的城市不过是乡村的附庸：直接或间接的多数城镇似乎都是作为农业秩序的一个方面发展起来，或是作为用以交换的市场、或是作为资金融通、行政管理和二次生产的中心，这反映了真正的农业社会的秩序，社会的有效根基是土地财产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生产[14]；但商业社会的兴起，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扩展，加大了城市对乡村各种资源的汲取，多数农村开始作为工业秩序的一个方面发展起来，即原材料的供应地和有限的消费市场，新的社会的有效根基，即商业利润，开始兴盛起来，乃至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和道德秩序。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乡村逐渐成为城市的依附，城市从而成为线性标尺下“发达”的象征。在这一线性标尺下，乡村作为一个有关过去的意象而与以往、人性和自然相关联，而城市作为一个有关未来的意象而与进步、现代和发展相关联[14]。

然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性后果的呈现，如市场风险、诚信危机、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等，乡村开始以一种特别的形象出现，以与当下的城市形成鲜明的对比：“一种观点认为乡村是经过耕耘的，这种耕耘就是朴实的成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未经开垦的、未遭破坏的，没有开垦耕种，而是孤立的大自然”[14]，原来人们喜爱的是经过开垦的乡村，后来却对“未遭

破坏的”地方投以强烈情感，而这种“未遭破坏”显然是和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改造是相对的。诸如“邪恶城市”与“纯真乡村”等意象，更是形成鲜明的对比。乡村成了一种文化上建构的“他者”，成为在心理或情感上满足人们某种现实匮乏或缺失的方式。

因此，乡村和城市以一种互为“他者”的方式建构彼此的价值尺度与话语形象：从城市有关“未来”的意象而被赋予“进步”和“发展”的价值，而乡村有关“过去”的意象而被赋予“未开化”的价值，到城市作为“罪恶之城”的意象而被赋予“非人性”、“非自然”、“破坏”的价值，而乡村作为“快乐往昔”的意象而被赋予“纯真”、“人性”、“自然”、“未遭破坏”等价值。在当下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其社会性问题愈是彰显，而乡村愈是消亡、遥远，愈是便于我们想象性的理想化建构；“邪恶城市”与“纯真乡村”的意象愈是彰显，“乡愁”就愈是兴盛。这种乡村与城市形象的“颠转”与互为“他者”的文化建构，构成了“现代乡愁”产生的时空条件与话语形式。

### 4.3. “社会底蕴”与乡土变迁

伦理本位和道德追求是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显著特征[16][17][18]。这种伦理与道德，把人当作家庭生活存在，将人与家庭的关系当作人的基本属性[19]，因此，家庭是这种伦理和道德基础，并由家庭将此道德义务和生命价值向外扩散，进而影响整个社会，而儒教国家自身亦是按照家庭关系中的伦理原则建立起来的、等级化的官僚和贵族机构[16][20][21]。在此意义上，中国传统国家和社会是同构的，结构化原则是“亲亲”与“尊尊”。这些特质已构成中华文明的肌理，即便在社会变迁时代，中国社会仍自发地保存着这些相对稳定的“恒常”，杨善华和孙飞宇称之为“社会底蕴”，它包括了生活的智慧、家本位文化、道德伦理、人缘口碑等[22]。

费孝通曾以“乡土性”概括中国社会基层的特征，“乡”是人们生活、聚居的特定形态，土地则是人们的命根，乡下人的一生都在与土地打交道[1]。乡土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既离不开“乡”，也离不了“土”，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更是与“乡”、与“土”直接相关：个人及其家族在“乡”里的人缘口碑、社会声望，继承于父祖的土地的传递与扩张。“乡”、“土”承载了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生活方式、联结纽带、生命意义等。换言之：“家”，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乡”，与“土”一起，既是前现代中国人共有的物质基础，也是其共享的精神观念，它构成了“社会底蕴”的来源，是“现代乡愁”上升为近乎全社会共有情感体验的内在条件，也是其得以扎根的文明基础。

但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大量的农民进城，为工、为商、为学，既离了“乡”、也离了“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联结纽带开始发生变化：传统社会中，作为不同个体之间联结方式的血缘、地缘，已不能满足社会现实和个体生存的基本需求，越来越多的人经由职业、政治信仰、宗教倾向、性别、年龄等多元因素组织起来。与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相应，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也更为频繁：人们经由做工、经商、求学，由普通村民成为经理、企业家、个体户、国家干部等，实现了社会地位的上升。但是，人们在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并不意味着与社会流动相应的文化和心理的适应，换言之：人们由乡村进入城市、由村民成为市民、由下层流动到中上层，但在文化上可能仍保留着“乡下人”原有的文化和价值认同。格尔茨称之为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断裂[23]。农民进城后，其“谋生”在城市，而生命的意义则在乡村。如红白喜事的往来、人生情感的寄托、春运不远千里回家过年等，仍与“乡”、与“土”有关。在此阶段的“乡愁”正处于从“传统乡愁”到“现代乡愁”的过渡，因而兼具二者的某些特点，但也有与众不同之处：时空条件上处于传统到现代转变之间；承载主体是在城乡之间不断流动的农民工群体；客体指向与表现形式上兼具“传统乡愁”和“现代乡愁”的特质；客体特征故而兼具“传统乡愁”之有形、具体、确定与“现代乡愁”之无形、抽象、非确定；主观体验上则因在城乡之间不断游走而与家人分离，既离不开城市，也离不开乡村，由此生发“有家难归”、“有根难依”



的情感体验；在触发情境与商品转化上，亦处二者之间。由此过渡阶段的“乡愁”特征，亦见“社会底蕴”或“乡土性”的稳固性。

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应的，是大量“乡村”的消失，无论是政治经济学层面，如“合村并居”与外来人构成的“产业村”，还是社会伦理学层面，“乡”或“家”的原有内涵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永恒和不变的那一半”正在被摧毁、扭曲甚至是彻底消失，乡村开始以荒诞、残缺、落后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6]，乡村正在消亡，如“半熟人社会”[24]和“无主体熟人社会”[25]之类概述。因此，乡村既在社会形态学上，也在社会伦理学意义上有所变化：形态学上表现为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农业吸引力的不断下降、农村空心化的加剧；伦理学意义上，则呈现出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25]、“无公德的个人”与“个体化”的持续加剧[26][27]等等，旧有社会规范其作用不断弱化，而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建立，以“信任”为例：传统社会基于人与人之间彼此熟识的人际信任，难以在不断流动的社会中发挥作用，而在陌生人社会中，抽象的规则体系逐渐取代人际关系，为人们信服。

玛丽·道格拉斯在社会制度对个体观念形塑的研究中强调在特定时期，我们开始能够瞥见一个共享的分类，将现在和过去隔开[28]。与此共享分类相应的，则是特定时期人们共享的生活感受、主观认知与情感体验。这种乡土变迁对既有生活方式、联结纽带、伦理规范等的挑战，成为一种共享的特定时代氛围，赋予人们以某种相似的生活感受、主观认知和情感体验，这为特定个体或群体的“乡愁”扩展为近乎全社会共有的“乡愁”提供了外部条件。

概言之：乡土变迁，既显示出“社会底蕴”或“乡土性”的稳定性，又表明一种共享的特定时代氛围，它们各自构成了“现代乡愁”扩展为近乎全社会共享情感体验的内在文明基础和外在社会条件。

## 5. 结论

基于以往“乡愁”研究的局限，如多从哲学、文学、或美学角度审视“乡愁”而忽视“乡愁”的社会学意涵，本文致力于探究“乡愁”生成的社会性基础，及其类型学差异。

本文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追溯了西语中“nostalgia”和“homesickness”一词及其概念演变，以及中文里“乡愁”的最初意涵，本文指出：“乡愁”原意是指对“家”或“乡”的眷恋，进而引申为对原初生活(如“乡音”、“乡味”、“乡俗”、“乡貌”等)的牵挂和向往；进而描述了“乡愁”的主观体验性、建构性、价值倾向性、特定情境性和审美性等五种特征，及其生成条件：时间维度上的记忆和闲暇、空间维度上的阻隔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匮乏或缺失。

其次，本文从时空条件、承载主体、客体指向、表现形式、客体特征、心理体验、触发情境和商品转化等维度，建构了“传统乡愁”与“现代乡愁”两种不同的理念型：“传统乡愁”是跨越时空的，但多存在于文人商贾、羁旅游子等少数流动群体，它侧重于“乡”，以“返乡”、“回家”为中心，表现形式是“老家”、“故乡”、“童年”等意象，因而其客体特征是有形、具体、且确定的，心理体验上是“有家可归”、“有根可依”的，其触发情境多与空间阻隔有关，故而相对单一，且一般不可转化为商品；“现代乡愁”源于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增长，以及社会的“陌生化”、“抽象化”，因而是现代社会情境下的产物，一种特定情境下弥漫整个社会的情感状态，近乎整个社会共有的一种心理体验或文化经验，它侧重于“愁”，以“渴望”、“批判”为中心，表现形式是对遥远过去、遥远乡村的想象性建构，一种建基于陌生人社会的文化他者，因而其客体特征是无形、抽象、且非确定的，心理体验上是“无家可归”、“无根可依”的，其触发情境在现代社会中近乎无所不在，故而相对多元，且可进行商品转化。“传统乡愁”与“现代乡愁”只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型，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乡愁”，则处于过渡阶段，因而兼具二者的某些特点：时空条件上处于传统到现代转变之间；承载主体则是在城乡之间不断流动的农民工群体；客体指向、表现形式则“乡”与“愁”、“返乡”、“回家”与“渴望”、

“批判”兼而有之，故而客体特征兼具有形与无形、具体与抽象、确定与非确定；主观体验上因在城乡之间不断游走而与家人分离，既离不开城市，也离不开乡村，由此生发“有家难归”、“有根难依”的情感体验；触发情境与商品转换上亦处于二者之间。

最后，本文探讨了“现代乡愁”的社会性基础：第一，从定居到流动，从共同体到社会，体现了人类生活方式、联结纽带和情感认同的重大转变：从生活方式极为相似的共同体生活到人们之间彼此分隔于不同社会分工部门的劳动生活、从人与人之间先赋的血缘与地缘联结到自主选择的职业或抽象理念联结、从对具有特定社会身份的个体的效忠和依附到对非人格化的、抽象化的规则体系的信服和依赖。这种生活方式和联结纽带的转变，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抽象联系日益增加，但具体的情感认同却日益稀少，而不得不诉诸遥远的“过去”和“乡村”，因而奠定了“现代乡愁”作为一种抽象情感依托的社会基础。第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乡村和城市以一种互为“他者”的方式建构彼此的价值尺度与话语形象：从城市有关“未来”的意象而被赋予“进步”和“发展”的价值，而乡村有关“过去”的意象而被赋予“未开化”的价值，到城市作为“罪恶之城”的意象而被赋予“非人性”、“非自然”、“破坏”的价值，而乡村作为“快乐往昔”的意象而被赋予“纯真”、“人性”、“自然”、“未遭破坏”等价值。这种乡村与城市意象的“颠转”与互为他者的文化建构，构成了“现代乡愁”产生的时空条件与话语形式。第三，乡土社会的变迁，既显示出既有“社会底蕴”或“乡土性”作为一种文明肌理的稳固性，又以其特定时期的社会变动和时代精神，赋予人们以某种相似的生活感受、主观认知和情感体验，这为特定个体或群体的“乡愁”扩展为近乎全社会共有的情感体验提供了内在文明基础和外在社会条件。

##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 1-9.
- [2] 赵静蓉. “怀旧文化事件”的社会学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5(3): 182-195.
- [3] 赵静蓉. 怀旧: 永恒的文化乡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4] 沈湘平, 常书红. 都市与乡愁[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5] 张叹凤. 中国乡愁文学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
- [6] 梁鸿. 作为方法的“乡愁”: 《受活》与中国想象[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 [7] 林东林. 身体的乡愁[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 [8] 赵李娜. 中国乡愁文化的历史脉络与现实依归[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3): 149-156.
- [9] 弗农. 远方的陌生人: 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M]. 张祝馨,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10] 霍姆斯鲍姆. 传统的发明[M]. 顾杭, 庞冠群,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11] 赵静蓉. 现代人的认同危机与怀旧情结[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8(5): 31-36.
- [12] 赵静蓉. 现代人归属感的缺失——以“公域”与“私域”的区隔为视角[J]. 江西社会科学, 2014(6): 27-32.
- [13] 赵静蓉. 现代人的“都市病”: 对城市化的怀疑与反思[J]. 都市文化研究, 2013(1): 136-143.
- [14] 威廉斯. 乡村与城市[M]. 韩子满, 刘戈, 徐珊珊,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15] 史华慈.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 程钢,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16]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17] 中村元. 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M]. 林太, 马小鹤,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 [18] 金观涛, 刘青峰. 观念史研究: 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2008.
- [19] 吴飞. 论“过日子”[J]. 社会学研究, 2007(6): 66-85.
- [20] 乔基姆. 中国的宗教精神[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
- [21] 周飞舟. 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J]. 社会, 2018(1): 41-62.

- [22] 杨善华, 孙飞宇. “社会底蕴”: 田野经验与思考[J]. 社会, 2015, 35(1): 74-91.
- [23] 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纳日碧力戈, 郭于华, 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24] 贺雪峰. 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J]. 政治学研究, 2000(3): 61-69.
- [25] 吴重庆. 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 [26]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 [27] 张良. 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公共性建构[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28] Douglas, M. (1986) How Institutions Thin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